

奇

士

中国第一玩家·文物鉴定家·收藏家·美食家

窦忠如·著



王世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奇

士

中国第一玩家·文物鉴定家·收藏家·美食家

王世襄

王世襄

窦忠如·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奇士王世襄 / 窦忠如著.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200-10529-2

I. ①奇… II. ①窦… III. ①王世襄 (1914~2009)
—传记 IV. ① K8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9095 号



奇士王世襄

QI SHI WANG SHI XIANG

窦忠如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35 印张 550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0529-2

定价: 14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责任编辑电话: 010-58572457



(著名漫画家丁聪速写的王世襄)

鄙貌不扬很难画，
使我满意少办法。
不怨画师艺不高，
只怨天生不潇洒。

——王世襄

作者简介

窦忠如，字子徽，号嘉山，安徽滁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中国最具独立精神和践行能力的学者型青年传记文学作家”之评。1991年携笔从戎，戍边塞外，十年军事新闻路，千篇文章携囊中；2004年抛却羁绊，弃“官”归隐，潜心研习传统文化，矢志读书著述怡性。

出版著作有《王国维传》、《梁思成传》、《罗哲文传》、《世间绝唱——梁思成与林徽因》、《北京清王府》、《雾开清西陵——中国最后一处帝王陵墓群写实》、《大匠踪迹》、“画说汉唐文化丛书”（《惊世奢华——解读满城汉墓》卷）、“中国·世界遗产探秘丛书”（4卷，中文繁体两种版本）、“中华国宝之谜丛书”（第一辑5卷）、“中华古建名胜丛书”（3卷）等数十部，有多部著作再版或重印，相关内容也被各类学术著述征引或报刊转载评介，并多次应邀做客央视和香港凤凰卫视等主流媒体传讲中国传统文化。

序：文博名家 鸿儒哲匠

——追思王世襄同志和我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时期的一段往事和情谊

罗哲文

我和世襄同志（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铃先生在八十年前就把研究营造同人称为同志，言志同道合者，并早已称世襄为同志）的交往，从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时期共同学习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开始，直到他去世前，一直没有中断过。抗战胜利，复员北平，新中国成立，他在逆境之中，以至粉碎“四人帮”参加全国政协，为家具、鸽子而努力等，近七十年可追思回忆之事甚多。今仅就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追思回忆，寄托怀念之情，并以在2009年12月8日国家文物局、中央文史馆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王世襄先生追思会”上，即席所成小诗一首中的几件往事，以为追思回忆：



罗哲文

难忘六十六年前，^① 古建班门^① 习调研。
杂草丛中勘古墓，旋螺殿下测飞檐。
陪都共赴护瑰宝，学社辛勤复汇刊。
老友魂兮巴蜀望，巴山蜀水笑开颜。

古建班门习调研

世襄同志于1943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满腔热情，冲破日寇占领区的重重封锁，来到被称为大后方的四川重庆参加抗战和寻求工作，因被一些“正统”观念研究院所和文教机构拒收（当时的大学研究生是很缺少的）找到了梁思

① 班门，鲁班门下。此指中国营造学社门下。中国营造学社是当时国内唯一调查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



成先生，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见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广泛的技艺才能，认为正是营造学社所需要的人才，便毅然接纳他成为学社的正式工作人员，给予了助理研究员的职称，并对他进行培养和重用。

中国营造学社自1946年进入清华大学创办清华建筑系（营建系），并与清华大学合办建筑研究所，到1948年北平围城，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为解放军提供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在解放战争中为保护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即完全停止了工作。曾经在学社工作过的同志仅世襄和我两人了，他的离去更使我无限感伤。在四川李庄、重庆这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中，我和世襄同志同窗共事，在梁思成、林徽因和刘致平、莫宗江等师长先进的教导与指引下，学会了基本的古建田野测绘调查研究技能，也决定了世襄同志一生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和丰硕成果。在他的第一篇宋墓考古报告的后记中，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杂草丛中勘古墓

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时期，除了调查测绘一些古建筑外，还参加了许多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中很需要建筑测绘和研究的工作，如莫宗江先生参加了成都王建墓的考古发掘，陈明达先生参加了彭山、乐山崖墓考古发掘，刘致平先生也在李庄清理了宋墓。世襄先生的第一篇田野调研报告即是《四川南溪李庄宋墓》（这篇报告虽然十分简要）。

该宋墓早已被盗掘一空，文物珍宝已经荡然无存，但墓室建筑结构与艺术依然无恙，却是研究宋代建筑的参考资料。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分配我和王世襄一起测绘，并分配刘致平、莫宗江先生作为指导，田野工作完成之后他写研究文章报告，我画图。报告完成之后他一定要写上我的名字，我说画图只是工具、次要的，作为协助即可，他认为“助”不好，后来写了个协理工作。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是他的后记，说明了他在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指导下对其一生学问产生的很大影响。由原来只是从事狭小的画学图籍艺术研究，而扩展成了多方面的学术领域研究，特别是古建筑的广阔领域，室内室外装修，家具门窗，油饰彩绘等。他重要的学术成果《明式家具珍赏》《髹饰录解说》等都是在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和梁思成先生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完成的。就是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战区文物保护和战后文物接管，也是在梁思成先生的极力举荐之下参与的。

他的文学基础很好，从这篇宋墓调研报告的后记中可以看出，现将他的手迹原文影印如下：

嘗嘗有志於中國藝術，而所涉範圍，至為狹小，僅閱於畫學之圖籍而已，此外別無聞焉。旋因論院作界畫，無一語能中肯綮，乃知非諳古代建築不足以言之，頓悟藝術中各學科咸有密切之聯繫，而治學基礎不可不廣也。

今年春，始來營造學社，就學於梁思成先生及與劉敦義、莫宗江諸先進，朝夕相處，指示實多。蓋一術語，一名物，往往積歲月之功而始能有所獲者，以告後學，直可以一語而中其鵠的，尤以思成先生鑿送法式新釋一書，附圖百數十幀，已將脫稿，取與魚文參閱，瞭如指掌。信矣治學精而求者受其惠，坐享其成，與躬親尋繹，其間譬透難易，未可以道里計也。

月前調查鎮南宋墓，曾隨往見習。既後，思成先生命草是為，維屢謝莫悔而終不獲辭。適強感語於末，蓋即此亦莫昧諸先進所賜也。

羅克敏女，曾協理工作，漢為製榫圖，并此誌謝。

三十三年六月王世襄

旋螺殿下測飞檐

这也是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安排的王世襄、卢绳和我共同实习田野古建筑调查研究的一个项目。在李庄附近有一座早已闻名的亭阁式建筑，它内部的藻井呈旋涡式的精巧如意斗拱，在历史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是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建造的。初步去考查了一下，确实有斗拱比较雄大、出檐较为深远的特征，于是派我们去实测研究。这一任务主要由卢绳来承担，我和王世襄做辅助工作，主要是拉皮尺量尺寸，卢绳勾画草图注尺寸。这一建筑虽然不算十分高大，但结构特殊，在四川当时所知明代建筑很少的情况下，也算是十分珍贵了。卢绳后来写了一篇较为丰富的考察报告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一期上。其时，他已回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文字和



图也是我为之抄写描绘石印的。

这里要说到世襄的情况，他本不谙拉皮尺量尺寸之道，但是为了学习也很是卖力。我和他上上下下，满场地奔跑，我上房他在下面指点部位，卢绳记录形制和尺寸。他很注意飞檐的挑出比例和尺度，因为这是鉴别古建筑年代的一个标准。最有意思的是，他后来也把这一工作当作玩意儿来对待，这就不觉得累了，有点“寓学于乐”的意味，而他被称为“大玩家”的说法从这时就已开始了。

这里还回忆起一件我和他玩蛇的故事。他说起在北平玩鹰、玩狗、玩鸟、玩蝈蝈的情况，我说还有一件东西要不要玩，他问是什么，我说说出来不要害怕，就是“蛇”。他有些紧张，我说不要紧，我能玩，可教你，他说试试看。四川多蛇，李庄学社经常有蛇出没，有一次我隔壁卢绳的斗室中忽然从屋顶上掉下一条蛇来，吓得他惊叫起来，我马上过去把它赶走了。我和世襄发掘古墓时，杂草丛中也有蛇，他起初有些怕，知我会玩蛇也就胆大了。在旋螺殿测绘时，忽然从斗拱上掉下蛇来，我马上过去抓住了它，等它一点也不动了，举起来玩了一阵才把它放了。四川许多人都能抓蛇，打蛇要诀是抓“七寸”、打“七寸”，就是蛇头之下七寸的地方是它的神经中枢，一抓、一打就不动了。这里也有学问，无毒蛇可抓，有毒的先要猛打，还要看蛇的大小定位，并非全在七寸位置。我教了世襄几次，他也了解了，但仍然不敢玩蛇，他说这玩意儿北方没有，不好玩，人都怕，玩不出门道来，就罢休了。

陪都共赴护瑰宝

要说的这件事情（陪都共赴护瑰宝）我和世襄虽然当时都在重庆，但未曾见过面，是后来谈起各自工作时才知道的。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出现转折，轴心国德、意、日行将败北，欧洲战场上的德、意法西斯相继失败，在亚洲，中国和太平洋各国对日本侵略军的反击也取得了节节胜利，中美盟军计划联合向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和日本国土进行轰炸，重庆国民政府成立了“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在反攻战争和轰炸中保护战区的文物古迹。梁思成先生被任命为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实际上是由梁思成先生在负责工作，他亲自草拟了敌占区的古建筑文物目录，他的手稿最近已在美国有关历史档案中找到。在文物目录上，还附有所在地区的文物位置图。由于这一工作十分浩繁，目录还有英文对照，因为世襄的英文甚好，于是在1944年夏天梁思成先生把世襄从李庄调往重庆为他整理编校目录（见1986年

第5、6期与1987年第1期《文物天地》王世襄所写的《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以及1994年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王世襄所写的《梁思成和〈战区文物目录〉》。我也同时被梁思成先生由李庄调到重庆参加在军用地图上画图、标识出文物古建筑位置的工作。由于我的工作绝密，所以两三个月时间都是在一座小楼顶层上单独的一个房间里，思成师每天抱着一捆图纸用铅笔画上标志符号，我用绘图墨水鸭嘴笔上墨，为的是要复印发到军队的指挥员手中。梁思成先生在这里背着国民政府十分秘密地向盟军（美军）提出了保护日本古都京都、奈良古建筑的特殊建议，因为在当时尚未认识到珍贵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财富的意义，较之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早了三十年。这一行动如果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或其他部门知道了就形同卖国。我当时在标识地图的时候也惊异有一批日本地图上的古建筑，但只是按老师的指示做工作罢了，绝对机密不敢提问。直到1947年北京大学宿白先生听梁思成先生讲座时，少数人才听闻了梁思成先生谈到这一保护人类共同遗产——京都、奈良文物古建筑的事。

最近，我在详读《梁思成全集》时果然发现他在《为什么要保护古建筑》一文中，伏笔谈了一句“保护敌国的古建筑”。时在1944年，正是盟军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的前夕，后来东京、大阪等被轰炸成焦土，而古都京都、奈良未被轰炸，大批相当于中国隋、唐、宋、元、明、清的木构古建筑得以保存。最近，日方友好人士和政界要人正筹备在明年（2010）古都奈良正式建都一千三百周年之际，在奈良为梁思成先生竖立纪念碑铜像，以表彰他保护日本古都文物古建筑的功绩。

学社辛勤复汇刊

这是世襄和我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时期，共同参加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学术刊物是一个研究单位十分重要的事，调查研究的成果都要在刊物上发表，积累的资料和经验，也是向资助单位和个人、向社会的公开报告。已经出版的六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由于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加之条件极端困难，只好一度停办了。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在李庄乡下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狠下决心要恢复。1943年至1944年，学社只剩下了梁、林二师和刘、莫二公，以及世襄和我几个人，思成师常在重庆，徽因师躺在病床上，致平先生为家小所累，主力就是莫宗江先生、世襄和我三人。今天，人们从汇刊七卷一、二期上不难看出，



誊写、描图大部分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手迹。

恢复汇刊可以说是学社同人全体总动员，全民齐动手，在齐心协力、互相帮助的情况下进行的。田野考察报告，各种写作、翻译文章，都要自己写、自己抄，图自己画，一些离社的人的文章和图，我们三人分别为之抄写和描绘。第一步是选择了石印的方法，因为它比油印好，能表现手写手绘的真实性。其法是在一种特制药纸上用特制的墨水书写和画图，然后将它拓印在光平的石板上，用橡皮滚筒加上油墨压印出来，效果甚好。我们三人每天分别把写好的药纸送到镇上的石印铺里，印好后背回到学社来。约有三里的路程，道路十分难走，但心里非常高兴，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成果。印完之后，还有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就是要把双面的印张折叠起来，以便装订。两百本上百页上万张的印张都要一张一张用手工折叠，实不容易。于是，发动全体，实在也没有几人，就连徽因先生的老母亲也来参加了。然后，就是分页成本、垛齐、装订，这又是一番复杂而又技术性很强的活儿。世襄兄本来不谙此道，但在此气氛下也干得不错，而且他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事来玩，虽然没有多大的学问可言，也算是一个玩的工作吧。装订完了之后，还要发行，也都是我们背到镇上邮局去的。

世襄和我秋天从重庆回来之后，就一直在忙着七卷一、二期汇刊恢复之事，足足半年多的时间，总算完成了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时期一件最重要的大事。两期汇刊的内容十分精彩，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建筑的报告首次发表，西南古建筑调查的文章和国外城镇、住宅的介绍等，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艰苦奋斗而又乐观的精神，永远也不能忘记。不久，鬼子投降，世襄被梁思成先生推荐参加战后文物接管保护工作。1946年回到北平后，我们又重新相聚。

其他

在李庄我和世襄好玩之事很多，在那样的条件下，没有剧场、没有电影等任何文娱活动，只能找些事情自娱自乐。在李庄时，他就喜欢厨艺，不仅向我们请的厨师学了不少手艺，而且经常到镇上有名的饭馆“留芬”去学艺，当然是先要吃饭付钱，然后到厨房与厨师拉关系，渐渐成了朋友。世襄有个特点，三教九流诸色人等都能混到一起，各种场合他都叫着我一起去玩，后山采橘子，过江抓兔子等，他都找我和他一起去。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于世襄、莫宗江和我三人均是单身，几乎每天下班后都结伴到镇上去玩。世襄年纪最大，长莫宗江两岁，长我近十岁。他牵着一條大黄狗，是金岳霖先生养的，很肥胖，叫菲提（fat之意），金回昆明西南联大后就归了他。莫宗

江背了一个竹筐，为了上街买点东西之用，我提着一个竹篮子，他在前，莫宗江跟着，我在后。到了镇上，找一个茶馆坐下来，喝茶，吃花生瓜子，与大学教授、学生及当地士绅人等谈天说地，自娱自乐消遣，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前些年去李庄时，还有一些老人说起当年的情景。快七十年过去了，两位良师益友已驾鹤仙去，我已八十有六，真有人生苦短之感。

2009年12月8日

作者注：1944年初，罗哲文与王世襄两位前辈先贤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相识后，就建立起了极为深厚的情谊，直到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辞世，这种历久弥新而醇厚绵长的情谊竟延续了长达近六十六年之久，这仅从罗哲文先生在2009年12月8日由国家文物局、中央文史馆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王世襄先生追思会”上，即席所成的一首小诗中不难获知。七年前，本书作者在罗哲文先生的美言引荐下，得以拜访王世襄先生并为其作传，后有幸得到罗哲文先生这位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唯一健在者的厚爱，将其依照先生所作小诗中所述两人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期间交往几事而撰写的回忆文章作为本书序言，在此敬以万分谢忱！



自序

我不懂收藏，因为不谙藏品鉴别；我不懂收藏家，因为他们的胸怀和行为往往让我感佩不已。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不能为我心目中真正的收藏家立传，比如本书的主人公——王世襄老。当然，对于为“奇士”王世襄老作传，我的心中还是有诸多“禁忌”的，因为他的收藏、收藏境界和学识修养，特别是一些在今天看来仍属奇异的“绝学”，几乎都不是我等晚辈后生所了解和熟悉的领域。但是，这同样不能成为我不能为其作传的理由和障碍，因为在我的骨髓里首先对于收藏，特别是一些诸如金石书画等传统文化艺术品的收藏，有着一一种与生俱来的喜好和莫名的偏爱，至于王世襄老所发掘和开拓的那些趣味“绝学”，更是人见人爱、人见人迷的性情之学或者说是兴趣之学。而随着我自2007年5月25日首次拜访王世襄老之后，以及在随后八个月间我夜不能寐、食不甘味一遍遍地拜阅王世襄老那等身之巨著及相关书刊史料时，特别是在这期间得以多次访问王世襄老及与其相交少则十数年多则数十年的老友故旧中，使我感觉越来越接近于王世襄老的“真我”——奇士。

在诸多关于王世襄老的文字中，“玩家”与“奇人”是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语，而我则以为这两个词都不甚确切，甚至有俚俗不恭、以偏概全之嫌，而“奇士”则较为公允、中肯、沉稳、雅当。“奇”，自然是指王世襄老的成长历程与众不同、治学方法令人惊异、所收藏品奇特美富、举止行为出人意料、学术研究独树一帜、收藏境界开阔高远；而“士”，除了是旧时对读书人的一种称谓之外，在这里更应该解释为对人的一种美称。

作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文物学家和最重要的文物收藏家之一，王世襄老学识宏博精深、著述厚重等身、学养高贵深湛、品操清远纯真、德行大气坚韧，岂是一个“人”字或“家”字所能诠释。当然，如果有谁要在“人”或“家”前面加上一个“大”字，我倒不会刻意表示异议，但是就如今市面上“大家”或“大师”泛滥这一现象而言，我还是想郑重地声明一下，我心目中的“大家”绝不是那种在某一领域取得点滴成就便自封头衔或利用媒体沽名钓誉的平平“专家”，更不是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囊腹空空如也者，窃以为这些都是浮躁功利社会豢养出来的浮躁功利之庸庸徒辈。而只有那些用高贵纯美品德滋养博大精深学问的人，才堪称一代“大家”。而作为王世襄老，

他不仅是我心目中名副其实的一代大家，更是世间极为少有但又绝对不可没有的一位真正“奇士”。

结识“奇士”王世襄老，实在是一种天缘巧合。2007年1月，拙作《梁思成传》出版后，不问收获只顾耕耘的我又集中利用时间完成了《王国维传》的创作。之后正待休整再战时，一日接到出版界友人电话告知说《梁思成传》出版后“备受好评”，遂希望我能写作《叶恭绰传》这一选题。作为一代收藏大家，历经世变的叶恭绰确实是中国收藏界可圈可点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当然也应该成为传记文学百花园中能够引起读者广泛兴趣而又不可或缺的一位传主。其时，这位友人正对收藏特别是家具收藏兴趣浓厚，所以当我随即将自己希望创作收藏家传记系列的初步构想提出来，并灵光火石地点出了近现代几位收藏大家的姓名时，没想到友人当即表示赞同，同时补充提出了当代收藏大家王世襄老的大名，这不由使我心怀忐忑地激动起来，因为王世襄老不仅是我久已仰慕的一代品操高贵的文物收藏大家，更是恩师罗哲文老多次在我面前提起的他在中国营造学社时就已结识并将深厚情谊延伸至今的一位挚友。作为中国营造学社仅此两位健在者，罗老和王世襄老在历经岁月磨难中都以坚韧和执着在文物研究领域各自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相互之间也建立起了极为深厚的个人感情。鉴于王世襄老是我们初步构思收藏家系列传记中唯一健在的传主，随即决定将《王世襄传》作为首选之作。于是，当我于第二天即2007年5月24日向罗老汇报这一选题时，罗老以一以贯之的支持态度表示了赞赏，随即还打电话向王世襄老鼎力美荐了我，并特意向其提起我就是《梁思成传》的作者。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这前一天即5月23日，王世襄老在翻阅当天《中华读书报》上刊登关于《奇人王世襄——名家笔下的俚松居主人》一书的评论介绍时，在同一张报纸上他还看到了评介拙作《梁思成传》的文章，这不由引起了他的关注。因为当年王世襄老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南下求职时，正是由于有了正在四川李庄主持中国营造学社事务的梁思成先生的“收留”，才使他从求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遭拒的尴尬中得以进入中国营造学社，从而迈向了此后使他蜚声国际的学术研究新天地。所以，当罗老如此向王世襄老引荐之后，我便于第二天即5月25日顺利地敲开了神往已久的俚松居大门，虔诚地拜访了令世人崇敬的一代“奇士”王世襄老。

在首次访问中，我不仅聆听了王世襄老满怀深情地回述其长达九十多年的坎坷人生，更享受了一次令人时而扼腕叹息、时而举手加额、时而啼笑皆非、时而欣慰满怀、时而震颤灵魂、时而锥心疼痛的精神沐浴。当时，我虽然顾虑到王世襄老的年高体弱而多次想站起身来辞行，但是满口珠玑的老人却接连几次说“下面还有故事呢”，使我几欲站起的双腿又矛盾地保持着原样。就这样，近两个小时的倾心畅谈，让我对心



目中的王世襄老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强记、博识、专注、执着、坚韧、勤奋、扎实、睿智、谦和、大爱、无畏、无私。而后来，随着多次访问王世襄老及其新朋老友，使我以上的这些感性认识变得更加具体而深邃。

那么，王世襄老到底是怎样一位“奇士”呢？

作为文物学家，王世襄老一生从事文物研究事业，其研究范围之广博可以说是无有出其右者。比如，属于文物研究领域中的“显学”的金石、书画、雕塑和建筑，王世襄老都有着极为精深的研究和著述；比如，在当时还属于鲜为世人所关注的家具、漆艺、竹刻、范匏、火绘、竹木牙角雕刻和匠作则例等一些具有工艺性质的领域，王世襄老也都进行了披荆斩棘般的研究和著述；至于豢养飞鸽、猎鹰、獾狗、蟋蟀等介于文物与民俗游艺之间的种种好玩器物，王世襄老不仅有着琳琅美富的收藏，而且进行了系统的挖掘、整理和深入研究，并都潜心撰写了足以填补这些方面空白的皇皇巨著或绝妙文章。

在这诸多研究领域中，王世襄老并非浅尝辄止，而是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研究成果有些至今也无人能望其项背。比如，在明式家具研究上，王世襄老以其深厚的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学、美学和民俗学等综合学养，历时数十年编撰了《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两部巨著，而当这两部巨著在海内外先后出版后，遂成为明式家具研究者之“圣经”；比如，在髹漆工艺和漆器艺术品研究上，王世襄老在注释迄今为止唯一留存的总结中国漆器工艺专书《髹饰录解说》的基础上，又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漆器》和《中国美术全集·漆器》两部重要专著，由此使其成为这一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比如，在豢养飞鸽、猎鹰、獾狗、蟋蟀和范匏、火绘葫芦等民俗游艺研究上，王世襄老在参阅存世稀少的历史文献同时，结合自己青少年时亲力亲为的实际经验，撰述出了一系列奇特绝妙的专著和文章，从而开拓了诸多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新的研究领域。

而在这诸多研究领域中，王世襄老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刮目相看的斐然成就，与其独辟蹊径的治学方法紧密相关。确实，解剖王世襄老多年来的治学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极为科学有效的治学方法——坚持文献、实物与工艺三者紧密结合的研究路数。而正是这种独到的治学研究方法，使王世襄老在一生的文物研究中即便是不甚熟悉的领域（比如乐舞），也能够很快并准确地找到研究的着眼点，从而取得了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甚至开拓出一个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作为收藏家，王世襄老所收藏品可谓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收藏方式堪称奇特绝妙、启人心智，至于其收藏境界则更是令人钦敬仰慕、叹为观止。确实，当人们打开装印精美的《自珍集——俚松居长物志》时，不难发现王世襄老将自己的藏品分

为十大类：古琴、铜炉、雕刻、漆器、竹刻、书画、图书、家具、诸艺和玩具。对于这些藏品，王世襄老曾自谦地说：“微不足道，自难有重器剧迹。在收藏家心目中，不过敝帚耳。”其实，在王世襄老的这些藏品中，不必说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宋“梅梢月”宣和式琴、明宋牧仲紫檀大画案和明黄花梨月洞门架子床等这类举世无双的“重器剧迹”，也不必说宋（元）四龙海水纹三足炉、明金髹木雕雪山大士像、明进狮图剔红盒与明朱小松归去来辞图笔筒等世所罕见的珍品，单是王世襄老所谓“玩具”类中的明万礼张五福捧寿过笼、清赵子玉五福捧寿拉花过笼和紫红松脖大蝈蝈葫芦等等，都堪称是藏家看重的珍品妙器。至于王世襄老当年求学燕京时亲自手植“又筠制”款月季纹蝈蝈葫芦，也被《国际亚洲文物展览图册》所收录，并经香港文物专家断代为清嘉道年间之物，由此可见王世襄老不仅所收藏品之琳琅精粹，就连自己所制之物也成为藏家追捧的珍品。而关于搜求购置这些藏品之经历，王世襄老曾如是说：“除舅父、先慈所作书画及师友赐赠翰墨文物外，大都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说家传、师友所赠及访寻于旧家之物之来历，单是从摊肆上搜购藏品的过程中，王世襄老也可称是穷搜广集，不遗余力。

对此，我在2007年11月3日专访著名旅游专家、红学家和古建筑学家杨乃济先生时，就曾闻知王世襄老当年为了访求到一件明式家具而不辞劳苦翻检鲁班馆内所有残破家具的诸多经历，以及因此而赢得“穷王”称谓的赞誉。这里的“穷”字，不单单是指王世襄老当年惯以极少资财购得珍稀藏品，更表示对其不惮艰辛搜求藏品精神之赞叹。确实，关于王世襄老那时不顾已逾古稀之年还骑着笨重单车穿行在北京市区郊外搜购家具的历历往事，我们不仅在其自撰文章里能够得知一二，而且在我访问其多位多年老友的过程中更是屡闻不鲜，而每每谈起这些往事，老人们至今还都歔歔慨叹不已。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些老人们的慨叹，因为像王世襄老这样出生仕宦之家且年逾古稀、学兼中西的饱学之士，竟然能够在市井之中历经千辛万苦搜求藏品，并与贩夫走卒之流相忘江湖地交往裕如，即便是在今天又能有几人如此呢？关于王世襄老起早贪黑出入晓市、鬼街、挂货铺、鲁班馆及荒村僻店搜求藏品的奇特经历，我将在正文中详细记述，在此不再聒噪絮语。

既然王世襄老在搜求藏品过程中有如此非凡之经历，从中所获经验自然也就成为收藏爱好者探求的秘籍，对此王世襄老仅仅用了四个字便予以概括——人舍我取。细细琢磨，不难发现这四个字实在是收藏之妙途正径。如果用世俗目光看待王世襄老的这些藏品，其经济价值无法估量，至于学术研究价值，则更是没有衡量的标尺，而王世襄老在整理这些“身外长物”时，就曾有这样一句经典概述：“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正是



因为有如此治学和人生之感悟，王世襄老在对待这些藏品上能够做出如下惊人之举，也就实在不算是有什么惊人的出人意料之事了。

据美籍华裔学者苏炜在一篇题为《金陵访琴》的文章中写道：一位曾经跟随袁荃猷女士学琴的年轻琴人造访俚松居主人时，见王世襄老一时事忙便上前搭手相助，而王世襄老竟将一张传世稀珍的宋琴（一说是明琴），不假辞色地轻轻一抬手说：“你懂琴，这张琴，你拿去。”关注王世襄老的人们都知道，在2003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的那场名为“俚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的拍卖会上，上述那张“重器剧迹”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竟然拍出了八百九十一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造了中国古琴当时世界上最高价的拍卖纪录。试想，王世襄老能够将倾世之心爱宝物托付给一位年少知音，这种清纯朗澈的高古品格，又岂是一般藏家所能揣度？！

当然，王世襄老之所以能够做到万金过手不假辞色，除了满足自己为妙音自古和者少的古琴能够寻觅到一个知音寄托的华贵心愿之外，还在于此前他早就有过一次世所罕见之举——将价值数亿元人民币的八十件明式家具以如今区区芳草地这套居所为值转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这就是王世襄老作为收藏家的收藏境界，这就是王世襄老这位“奇士”的奇异之举。

作为民俗学家，王世襄老一生对曾经流行于老北京的诸多民俗文化进行了不辍的实践与研究，特别是晚年以后更是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对一些已经失传或濒临失传的民间游艺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和研究，并在一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撰写出了一部部独门绝学专著，从而为世人开拓了一门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的新的研究领域。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因为王世襄老“自幼及壮”曾经“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搆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至于“养鸽放飞，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以至“京城第一玩家”乃至“中国第一玩家”的名号毫无商量地戴在了他的头上。对此，王世襄老曾颇不以为然地予以反诘说：“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确实，王世襄老实在是一个会玩且玩得极好的“玩物大家”。不过，在这里笔者愿意将自己潜心对王世襄老的研读心得，特别强调出来与世人商榷分享：那就是应该将王世襄老人生历程中的自然天性之“玩”与研物治学之“玩”严格地区别开来，而不应该以一个“玩”字或“玩家”来笼统地概述其多姿多彩的丰富人生。毫无疑问，玩是一个人的天性，特别是一个人在年少时生活中的主色调或次主色调，而对于生长在京城仕宦之家的王世襄老来说，其年幼时因为家庭条件优裕及母亲过于宠爱等缘故，更是将玩耍一词体验得淋漓尽致。至于王世襄老在《北京鸽哨》一书自序中自评“自